

控烟法令有必要升级为国家版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姚宏文近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人,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8.1%;7.4亿非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危害(1月15日《法制日报》)。

长期关注吸烟对青少年影响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综合性的控烟法律,仅有相关条款散见于不同法律法规中。当前立法工作的滞后性导致了控烟不力和停滞。此前,深圳市作为全国首个进行地方立法控烟的城市,早在1998年就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但实施情况并不理想。2011年,卫生部公布修订后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自该年5月

1日起宾馆、饭馆等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因为种种原因未执行到位,该规定变为一纸空文。各地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现状依然是禁而不止,公众场合全面禁烟遭遇执行难题。

近年来有关禁烟的地方性法规纷纷出台,对于推动全国的禁烟立法和禁烟工作无疑具有促进作用。不过,禁烟地方性法规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特别是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和全社会真正形成控烟的合力。

加快制定出台国家版的控烟法律法规。作为涉及多个执法部门和全社会的控烟活动,应当制定更权威的法律法规,建议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性质的控烟条例,必要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法律性质的控烟法。

控烟法令的多头管理往往容易陷入无

人管理的真空。控烟工作通常涉及卫生、爱卫会等多个执法部门,大家都管结果往往导致没有一家管。诚然,多部门执法的确容易导致相互推诿。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控烟单靠卫生行政部门一家孤军奋战又不现实,多部门执法体制依然是控烟的首选模式。由于吸烟的场所非常多元,由单独的卫生部门变为多部门联合执法,可以加大执法力度,但是执法部门增多,就难以排除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况出现。建议在控烟法规中明确规定各执法部门的具体职责,只有分工明确才能有效避免推诿扯皮问题。

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专门控烟执法队伍,进一步精简执法部门,形成执法合力,避免多头监管。控烟执法队伍缺乏、执法力量严重不足以及多头管理带来的无人管理,都是当前制约控烟工作发展的重要现实问

题。控烟工作除了专门的执法队伍,更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充分吸纳社会志愿者和民间公益社团参与控烟活动。需要指出的是,有专家呼吁控烟工作中强化公安力量的介入,笔者认为还是要慎用警力,关键是各相关部门要各尽其责通力配合,而不是也不宜寄望于警方的强制力形成的高压态势。

继续加大控烟地方立法的力度。在卫生部门禁烟令可操作性较弱,国家级控烟立法依然滞后的情况下,应当鼓励和推动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探索性和操作性更强的控烟地方性法规,为落实卫生部门的规定创造条件,为促进国家控烟立法积累经验。

期待控烟立法尽快升级,国家版的控烟法令尽快出台,为全国范围的控烟行动提供权威的法律支持。

刘武俊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明确提出,六种情形人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考察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当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1月16日《新京报》)

干部任用新规 回应群众关切

修订后的《干部任用条例》,从选任原则到考察内容,从考察对象到拟任对象,从提拔资格到公开选拔,从干部免职到干部交流,从引咎辞职到责任追究各个方面,均体现了中央对干部工作的新精神新要求,吸收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经验新成果,是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的改进完善。

其中,呈现出的一些鲜明特征与特点,可谓是回应了群众对于干部任用的关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选任原则、考察内容和考察对象上的细微变化就能看出一些选拔任用方向上的根本性转变。

对比2002年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新条例增加了“以德为先”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明晰了德和才的优先次序和谁主导谁的问题。“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德是做人、做事、为官的根本。对于任何人,德对才都有着几何式的影响,决定着才的根本方向。有德,才可以实现正增长;无德,才则逆转之下,呈现负增长。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他们身居要职,对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他们的德才更具有放大和示范效应。

在考察内容上,新条例增民生改善指标,改变“唯GDP政绩观”,防止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工作实绩。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同时,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科技创新、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的考核,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债务状况等指标的权重。这就意味着,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评价,将着重放在执行政策、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内容上,是更加全面、均衡、健康的考察。

在考察对象上,“裸官”、“跑官”等六种情形禁列为考察对象。只要触碰到这六条“高压线”,是不可能再获得提拔、升迁的机会。除了“裸官”、“跑官”外,还有代表群众基础的群众公认度不高的情形,代表能力欠缺的近三年度考核结果中有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情形,以及代表个人污点的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情形等。这些情形,正是近些年来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群众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是风向标,引导着我们的干部该怎样对待工作、梳理工作重点,明确了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样的人重用的问题。它不仅是做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遵循,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更是对群众关切的积极回应。

宋华

“鹏,打了好多次电话你也不接,或许在这里才能让你看到。爸妈再也不逼你结婚了,今年回家过年吧!爱你的妈妈”。

逼婚逼不来人生缘分

1月14日,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家华文报纸在头版刊出广告,一位中国妈妈以不逼婚为条件,劝儿子回家过年。这则广告以“给儿书”为标题,全文仅以上几句话。(1月16日新华网)

儿子玩失踪,是因为逼婚太可怕了。一个带本土特色的通字,能逼出年轻人的焦虑,逼出亲情的寡淡,逼出两代人的隔膜,甚至于逼出“仇”气来。

事实上,在现实语境中,逼婚已经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每逢佳节被逼婚”,人数不在少数的年轻人都是在硬着头皮承受这一压力。每到过年,被亲友问“什么时候结婚”,成为很多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更有甚者,过年时被密集安排相亲。

何必逼儿女太甚?这在于做父母的在这种事儿上有一种强势心理:逼你是为你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婚嫁年岁,不婚不嫁,不成体统。其实,说是为了孩子,可到底还是为了自己,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想要他念书给自己挣名声时就禁止他恋爱,想要他结婚给自己挣面子传宗接代时就强迫他相亲,虽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但说来说去,这样的父母满脑子寻思的,都是自己的那点儿乐子。无论如何,儿女自身的感受与选择都居于次要地位。

一般做儿女的,没几个会无缘由地抗婚。婚恋迟迟没来,多数是缘分不至。现代社会,人人都戴着面具生活,这一半儿找到那一半儿,不是一件易事。此外,还有就业、房价攀升、CPI涨幅比工资过快等诸多压力,也给他们的婚恋增加了难度。伴随人均受教育年数的延长,高学历增多,谈恋爱时间变少,更是让年轻人婚恋年龄向后一拖再拖。

缘分是一种人生机缘,甚至是运气,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缘分靠碰靠撞,逼是逼不来的。从社会学、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说,婚恋关系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最有利于双方充分发展的一种关系。意味着同甘共苦患难,还必须把对方看作独立的人。可以说,做人难,做现实中的年轻人难,做婚恋关系中的年轻人更是相当难。

婚姻是人生大事,多数人对之都是慎之又慎。其实,当下年轻人的婚恋问题,做父母的都很难插手。在家庭内部问题上,做一个开明的大人,比什么都重要。儿孙自有儿孙福,对儿女不要逼得太紧,该放手时就放手,儿女个人的事主要由他们自己做主。越是让他们自主处理自己的事,他们越是有可能更早地找到自己的幸福。今语



“湖南烈士公园内,隐藏着一家私人会所,晚上很多人开车来,吃饭时关闭大门,只留小门。”接知情人爆料,记者暗访了烈士公园内的“私人会所”,发现它很会隐藏自己,烈士公园的围墙、茂密的树林,分别将会所遮挡住一部分,园内的游人,都难以察觉它的存在。傍晚时分,不时有保时捷、宝马、奥迪等车辆驶入。(据《潇湘晨报》) 春鸣漫画 言者文

市委书记扫厕所凸显旅游治理乏力

据报道,1月13日下午,云南大理州委常委、大理市委书记褚中志走进桃源码头旅游厕所。厕所年久,是老式蹲坑,便槽、臭气熏天。褚中志左手拿笤帚扫烟头,右手持铁钳,清扫了20分钟。

俯下身子扫烟头,拿起铁钳夹脏纸,该市委书记的举动不失为亲民之举。不过,这也引发舆论褒贬不一。有人觉得书记俯下身来是好事,有人觉得他这是“越俎代庖”。

书记能去扫厕所,这事本身并无不妥。每个公民都有责任保持城市环境清洁,书记亲力亲为,说不定还能带动更多人行动起来。不过,扫厕所终究不比乘地铁,是职责范畴内的必要体验。比起工作职责,书记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其一,从报道中可知,褚中志所扫厕所所在景区内,旅游厕所居然还是老式蹲坑,这让人生出疑问,大理市这样的厕所是仅此一例,还是普遍存在?作为一个以旅游立市的城市,为何没能建起合乎卫生条件的冲水式公厕?比起扫这一个厕所,公厕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更重要。

其二,市委书记本可在“治理”

据媒体报道,在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限制“三公消费”等背景下,茅台、五粮液等高端白酒仿佛在一夜之间跌下神坛,价格几近腰斩。更有业内人士说出,一斤茅台酒的成本不过40元。

茅台成本反映的畸形产业才是真问题

看到这条新闻,读者可能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常喝茅台酒的会大呼上当,另一种则是认为茅台酒价格太高的终于找到攻击点,对“定价虚高”大加指责。不过,我却很怀疑这种成本计算方法的科学性。

新闻中说,计算方式是扣除广告推广费、管理费、税收、工资等等之后,“实际成本只有几十块钱”。此外,“酿造一斤白酒的粮食成本只有十几块钱,人工费用是三四块钱,把储藏成本和酒瓶全部计算在内,一斤茅台酒的成本不会超过40块钱。”这两种算法都将“成本”的概念偷换成了“原材料”,得出一个吸引眼球的数字不奇怪。产品成本和原材料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以白酒企业而言,广告费用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参照央视广告标王曾连续几年花落白酒企业,可想而知这方面的支出甚至可能占到了成本相当大的比重,轻飘飘一句“扣除”就抹掉了,实在有失公允。

哪怕算上广告支出等全部支出,计算出来的成本也并不成为指摘其定价的理由。茅台等高端白酒品牌,事实上已经跨入“奢侈品”行列,甚至还曾入选过胡润“奢侈品榜”,与路易威登这样的品牌平起平坐。奢侈品的定价很大程度上是隐性价值,比如品牌价值、身份象征等。经济学上有个“凡勃伦现象”,即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奢侈品定价的逻辑就在于此。此前五粮液曾宣布每瓶提价50元,理由是“为满足消费者的身份需求”,无疑是高端白酒定价适用“凡勃伦现象”最好实例。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指责茅台定价虚高都是个伪命题。白酒行业是一个非垄断市场,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定价主导权在企业。而这个伪命题背后的真问题却是与谁指责茅台为什么定价这么高,不如想想定价这么高,为什么有人买?到底是哪些人在买?

这已不用过多解释,三公消费一收紧茅台等高端白酒价格立即跳水,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高端白酒与公务消费的紧密联系。定价动辄上千元的高端白酒,若是土豪自掏腰包自己喝,这是“拉动内需”,应该欢迎。但若是成为“公务用酒”,用公款埋单,这就很有问题。

因灰色消费兴起的产业又何必高端白酒,此前在中央禁令之下,贺卡、历史企业也损失惨重。这些事实说明,与白酒行业一样,公务消费是这些产业的大金主。日子越来越难,对他们其实是危也是机。公务消费对于性价比、质量、售后等往往不大有兴趣,更多掺杂人情关系甚至腐败,只有在民间消费市场上接受考验,才能锻炼出企业真正的竞争力。官场一感冒,企业就咳嗽,这样的产业是畸形的产业。如今,茅台摆脱“官酒”身份走下神坛一点都不难堪。希望还有更多“因公兴起”的畸形产业,也能早日回归常态。

张涨

演艺公司“惨淡一片”但愿不是浮云

去年8月12日,中央五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再加上此前中央出台的关于改进会风的八项规定,让各大电视台纷纷响应,停办多场晚会演出,许多晚会庆典也纷纷瘦身,演艺公司的业务无疑遭受了重创。业内人士指出,2012年国有演艺集团的总收入为124亿元,其中政府扶持与重点补贴的则有86亿元,换言之,2013年,上述两大政策使得国有演艺集团的收入损失近2/3。

禁令之下,靠公款消费谋生的市场主体,必然会受到相应的影响。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惨淡”新闻的出现,但就此说,反腐倡廉取得了实质成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无疑太过于乐观。无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现实的情况来说,吃喝玩乐行业的“惨淡一片”,也可能只是浮云一片。

反对铺张浪费,改进工作作风,远比想象中更加艰难。今天的诸多问题是多年积累而成的顽疾,既要用猛药急攻,又要用温药慢慢调理,才能实现标本兼治。多年养成的习惯很难一下子就解决,体制内形成的潜规则也无法一时就得到消除,这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若稍有放松就可能触底反弹。更何况,时下的这种“惨淡”之状,也许并非真实状况。实际问题也远比预期中更复杂,谁又能说“惨淡”不是一种矫情的表达?

若是不能扎紧钱袋子,实现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那么“惨淡一片”的演艺费,可能通过另一种渠道悄然流失。莫被浮云遮望眼。“惨淡”的矫情之前也有所发生,类似的整治也经常开展,何以巩固成果实现长效治本,恐怕才是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八项规定初战告捷,但公众对此依然保持着理性的认识,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81.2%的受访者一直在关注八项规定的落实情况;25.4%的受访者感到,一年来自己所在地的官风有所改进;也有66.4%的受访者表示,八项规定在当地的落实情况不太理想;52.9%的受访者期待加大力度。真实的感受也是一种真切的需求,演艺公司“惨淡一片”若不想成为浮云,还需做大量的工作,走很长的路。

堂吉伟德

“微”而可道,改变生活

记录微博客、观看微电影、发起微公益,想购物有微促销,想出门有微旅行,还有数不清的微梦想、微道德、微表情……林林总总的微生活和数以亿计的微个体,将一个“微时代”推上前台。

“微”观念普及,“微”元素盛行,得益于微博、微信等微媒体的技术支撑。140个字或1分钟语音的表达与交流中,可以传递信息、交流感情,也可以照见观点、启迪思想。形式更便捷、平台更广阔、个性更张扬,因而聚拢了更多人气。微时代,可说是网络时代公众参与的必然走向。

更重要的是,微字背后,是信息被接受的“被时代”向信息定制和分享的“我时代”转变。这是一种全新的聚合式“生产方式”。微,所投入的或许只是点滴成本;车上厕所的心多用、茶余饭后的休闲时间,都可以被微所覆盖、所充实。而微的精确打击,更让“私人定制”一般的生活体验,产出更具含金量的信息和服务。当“国字头”部委微博集体上线,政务微博总数以十万计;当微博客自发组织,凝聚“我们都是雅安人”的能量,恐怕没有人会怀疑“微”而可道。

微,让表达门槛变低;走上前台、展示自我、分享生活,很多平凡的人生在微时代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微,可弥合人际距离:现实的沉默让位于网络的热烈,曾经天各一方,而今朝朝暮暮;曾经以邻为壑,而今鸡犬相闻,难免让人浩叹“网络让世界变小”。

繁荣背后,也有隐忧。网络上擅长“微新闻”的标题党,每每断章取义;地铁上沉迷“微媒体”的低头族,看的不是书本而是手机……当整体性思考被微小的碎片所取代,如何避免认识被“微”碎片化?当只言片语的吐槽变成众声喧哗的狂欢,又如何防范价值被“微”肤浅化?越是各有怀抱的时代,越需要建设心态和理想情怀;越是万众独

我的演进,越不能缺少文化担当和整体考量。在诉求个体利益的同时多一些宏观思考,在专注自我小圈子的同时多一些虑他情怀,唯有培养好社会的共有价值,个体价值的绽放才能绚烂绽放。

不独是文化层面,社会治理覆盖若跟不上,微时代可能同样难以维系。言语暴力不能从根子上根除?负面情绪会不会误导网络舆论?这些都考验着治理智慧。问题不仅限于此,“3Q大战”可不可以不再重演?电子商务可不可以趋向秩序稳定?这些也都呼唤着社会治理的创新和跟进。对治理者而言,提升微素养,强化微管理,创新微服务,是完善基层治理毛细血管的必然要求,更是时代赋予的艰巨任务。

涓滴之水,汇流成河。微,是一种力量。我们要做的,是在每一次的鼠标滑动和键盘敲击中,记录时代、记录美好,汇聚起中国前行的磅礴动力。

李斌